

吉登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解读与评述

蒯正明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当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化影响和播撒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和国际交往层面上,它还表现为风险的全球化,各种风险犹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造就了一个风险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对此,吉登斯用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来解答风险全球化的动因、景象,并提出了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思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它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吉登斯; 风险社会; 评述

中图分类号: D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1-0029-07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view of Giddens' Global Risk Society Theory

KUAI Zhengming

(The Marxism Institut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 The impact and spread of globalization not only stays in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evel, but also expresses as the globalization of risk, various risks like a sword of Damocles hanging on the top of the head of the human, and thus create a world of risk, a runaway world. In this regard, Giddens uses a new theory of modernization——the risk society theory——to answer the motivation and scene of risk globalization, puts forwards the train of thought of coping with global risks, and forms a comprehensive global risk society theory, which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be fully aware of a series of limitations of the theory.

Key words: Giddens; risk society; review

当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化影响和播撒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和国际交往层面上,它还表现为风险的全球化,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波及全世界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就连“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也已经“全球化”和“普遍化”了。而在风险全球化问题研究中,吉登斯的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试图用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来解答风险全球化的动因、风险景象,并提出了应对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思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

一、现代性、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全球化

(一) 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关于什么是现代性、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哈贝马斯认为“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p1)} 吉登斯是通过社会学的

收稿日期: 2011-12-12

作者简介: 蒯正明(1977-),男,安徽肥东人,法学博士,温州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角度来解读现代性的,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 17 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p1)} 它包括四个制度性维度:(1) 工业主义,指的是蕴含于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2) 资本主义,指的是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3) 监控系统,指的是对信息的控制以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监控制度;(4) 军事力量,指的是在现代战争本身的高度工业化条件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风险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传统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只有当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时,人类的风险意识才开始勃发出来,风险概念也才会产生。对此,吉登斯也认为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被发明出来用以刻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一个概念。他指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3](p17)} “‘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分离。”^{[3](p27)} 由此,吉登斯进一步将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和人造风险。自然风险是外部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是以时间序列为依据来估算的风险。^{[2](p110)} 随着人类自身知识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种新的风险形式出现了,吉登斯把它称为是“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简称“人造风险”。与自然风险相比,人造风险是启蒙运动带来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因此,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主轴线,这样,当代人就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被自己制造出来的“风险社会”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3](p23)} 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由现代性所引起的可见,是现代性发展的悖论。

(二) 现代性与全球化

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关系上,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后果,“现代性正在内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2](p56)} 而现代性之所以能够推动全球化的形成。吉登斯认为这源于三大因素即: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现代性的反思性。

第一,时空分离。吉登斯指出,在前现代社会,由于时一空伸延的水平低下,人们的交往是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进行,消息比较闭塞。而在高度现代性的状况之下,时间和空间都趋于空洞化,也就是说逐渐与具体的地点、事件相分离,逐步取得高度的标准化、精确化。时间和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统一协调,空间与具体的场所相分离,从而使不在场的东西愈益决定在场的东西(这显然和沟通、传媒方式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这种分离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变化,更不仅仅是什么速度的提高引起所需时间的减少,而是(特别由于电讯的出现与迅猛发展)沟通与交通的分离,身体在互动之中无需直接在场。随着时一空伸延水平的提高,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某一事件可以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的交往形式也由前现代社会的自然交往发展为现代性社会的世界性交往。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第二,脱域机制。吉登斯在分析了现代性与时间、空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时一空分离与脱域的问题。吉登斯认为,“脱域”就是把社会关系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剥离出来”,从而能够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吉登斯并没有采用以往受功能论影响的现代化理论中所习用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或“专门化”(specialization),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范畴是旧有功能论和进化论思维的产物,不适于时空伸延视角下的分析。他特别指出,以下两种脱离机制从本质上带动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一是象征符号(symbolictoken),即超越具体个人或群体的普遍化交换媒介,比如货币、权力和语言;二是专家系统(expertsystem),即手艺或专业技能的系统,它们构成了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这些都与高度技术化和风险社会环境下的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吉登斯提出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其目的就是通过“反思”这一概念突出“知识信息”在修正、调整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他所说的“反思”概念涵义相当宽泛,不仅指对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形式的不断再认识、再思考,而且还包括“收集和汇总官方统计数据”这类活动,但在根本上突出的是“知识的生产”,尤其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它构成现代性的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本质因素。在具有高度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中,社会科学和它所考察的对象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不仅在实质上大大增强,而且在被人们所认识到的程度上也大为凸显。

总之,正是时空分离使社会生活在无限范围内时空延伸成为可能,也促成了更为宽广的社会体系的出现。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2] (p47)}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冲击着传统,“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2] (p47)} 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性“犹如置身于朝向四方急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2] (p47)} 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全球化。

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化的维度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也相应地发展成为四种全球化的维度:(1)世界资本主义经济;(2)国际劳动分工;(3)民族国家体系;(4)世界军事秩序。它们同样是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吉登斯分别从这四个维度对全球化加以剖析。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在资本主义国家,即那些以资本主义经济企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这一维度的全球化表现为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这些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经济权力,并且拥有影响本国基地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决策的能力。第二,是工业主义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全球性劳动分工的扩张。这包括世界上高度工业化与低度工业化之间的分化。现代工业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建立在工作任务的水平上,而且还建立在世界各地之间在工业类型、技术、原材料生产方面的地区分化水平上的。工业主义全球化造成了大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它的影响不单局限于生产领域,而且还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一般特性。第三,是民族国家体系。如果说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中的“行动者”,那么民族国家就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重要“行动者”。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国家之间的联盟虽可能会削弱国家的主权,然而通过国家之间的联盟又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力。第四,是世界军事秩序。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局限于武器和不同国家之间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还关系到战争本身。在核战争时代将没有赢家,外交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战争。

(三) 现代性、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全球化

现代性不仅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也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当现代性跨越时空,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后,它的不确定显露了出来。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代价,造就了一个不是“现在”(now),而是一个“从现在开始就会存在”(from now on)的危机性问题。各种新风险犹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造就了一个风险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吉登斯指出“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2] (p6)} “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社区问题,他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世界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2] (p57)}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进一步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具体分析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由于资源方面的限制,追求资本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它也必将会导致全球性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世界经济在加速增长,但经济不平等也在加剧,资本主义市场常常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面产生两极分化,带来了大规模贫困的发展,形成了全球性贫困。“世界人口的20%以上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人不能正常地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4] (p101-102)}

第二 生态破坏。工业主义的发展、现代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们对自然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它的后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吉登斯警告说,事实上,当地球上再也没有神智

清醒的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现代性的全球扩张,理性的膨胀不仅没有使人类的家园更美好,反而人类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园。

第三 极权政治的兴起。监督活动的加强一方面提供了许多民主参与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垄断暴力手段,并把它作为恐怖工具的利益集团支配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即是如此。对此,鲍曼也认为,极权主义与现代性并不是偶然地而是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极权主义也有了很大的增长。

第四 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作为一种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现代武器,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远远超过了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国家的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非常弱小,军事力量却很强大。从决非不重要的意义上说,在武器方面没有“第三世界”,而只有“第一世界”,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储备了技术先进的武器,而且彻底实现了军事现代化。拥有核武器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大规模常规战争甚至核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吉登斯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思路

如何应对现代性引发的风险全球化问题,西方学者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并没有结束,今天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对理性的理解有误造成的,因此他试图通过其交往理性重新规划现代性。以利奥塔、福柯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认为按照启蒙现代性思路展开的现代化过程是失败的,认为知识的确定前提已被否定,再无确定性的知识,人类社会根本没有统一的运行规律可言,今天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表明已进入后现代社会之中。因此,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是——否定现代性。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的是,吉登斯既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坚定地捍卫现代性的合法性,也不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简单地以“后现代性”来代替“现代性”,他指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2] (p3)}为此,他主张对现代性运行中引发的风险应正确认识,风险对于人类来讲是与机遇同在的,要化风险为机遇,建构一个既与启蒙现代性传统有联系,又能针对今天现实的应对思路,以“驾驭那头猛兽”,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低点。

对于马克思着眼未来提出的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吉登斯一方面强调,“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2] (p136)}另一方面又指出,“按照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批判理论,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方向,而且历史将集中在一种革命的力量上,这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历史没有目的论,在实现价值的转变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力量”。为此,吉登斯的结论是“我们还是不应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2] (p136)}“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来。”^{[2] (p135)}

那么什么是乌托邦现实主义呢?对此,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中解释到“之所以说是‘现实主义’,是因为一种批判理论,一种批判性政治必须把握实际的社会进程,提出具有某种根据的观点和战略;之所以是‘乌托邦主义’,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社会反思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在这种领域中可能的未来经常不是限制现实,而是有利于现实的形成,现实的模式直接影响着即将出现的模式。”^{[4] (p262-263)}通过吉登斯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基于理想模式的“乌托邦”,因为,“乌托邦式的空想毫无用处,而且可以说,如果把它用于威慑性政治的话,它可能还极具危险性”。^{[2] (p136)}因此,乌托邦现实主义中的“乌托邦”是以现实为前提所提出的乌托邦,是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即“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2] (p136)}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乌托邦现实主义呢?具体说来,吉登斯应对风险全球化的思路是怎样的呢?吉登斯认为,当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与现代性制度密切相关的几种社会运动,即劳工运动、生态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指针”,^{[2] (p139)}“社会运动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的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成了通向未来的车轮”。^{[2] (p141-142)}其中,劳工运动是通过工会制度对工作场所进行防卫性控制,或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去影响或左右国家权力。特别是在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工运动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主要斗争工具。民主运动是人们行使监督权的重

要方式,民主运动的推行可以极大地抑制极权主义,使监督的权力落入人民而不再是主政者手中,而这种民主运动的理想性后果就是多层次民主参与(multilayere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因而它“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中,具有普遍的意义”。^{[2] (p141)}生态运动力图反对的是现代工业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它如果能理想化地发展,便可争取达到科技人性化(humanization of technology)。和平运动的推行,可以使各方都明白任何大规模战争都是相互伤害,核战争是永远没有赢家的。因此,依赖和平运动才可望达到世界非军备化的理想。

在阐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要有效应对全球风险社会还应当有一套推动和影响全球性制度变迁的思路。为此,他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为基础确立的,即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四个制度维度分别对应为后现代秩序的以下四个制度维度:超越匮乏型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非军事化。在这四个后现代秩序的制度维度中,超越匮乏体系、技术的人道化、非军事化对于保证整个人类的生存非常重要,而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则对个人自我认同的实现意义重大。在吉登斯看来,只有后现代秩序的这四个维度都实现,才标志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实现,才标志着现代性风险的解决。具体而言:

第一 超越匮乏型体系。吉登斯认为,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增加财富的办法已无法解决世界上存在的贫困问题。为了摆脱“贫困大毁灭”的窘境,吉登斯提出了“超越匮乏型体系”的设想。那么什么是超越匮乏体系呢?吉登斯认为,首先它不可能是现存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因为它构筑了一种经济上低效、政治上集权的工业化的管理模式。但另一方面,如果“任市场在基本上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去自由发展,就会在生活机会上制造许多群体差异和地区差异”。^{[2] (p145)}可是,超越匮乏型体系可以使之超越这种两难困境。因为,当主要的生活物品不再匮乏的时候,市场标准就只能起到信号的作用,而不再是维系随处可见的剥夺机制了。对于超越匮乏型体系的意义,吉登斯强调“为了寻求一个不是沿着自我毁灭之路而行的世界,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在资源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维系。”^{[2] (p145)}因此,超越匮乏型秩序将包含对社会生活方式颇富意义的改造,在其中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将不得不有所调整,重新分配全球财富的呼声也将日趋高涨。超越匮乏型体系即使最初只在世界较为富裕的地区发展起来,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这就必须发展世界规模的社会化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只是帮助协调全球的经济交流,而不是去扮演“发挥控制作用的统治者”的角色。在吉登斯看来,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变为超越匮乏经济体制,这样做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按贝克的话就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5] (p6)}

第二 技术的人道化。工业主义带来的不断的技术创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呈现出相反的趋向。从而出现了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枯竭、森林面积锐减、土壤大面积沙化、许多动植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这些生态灾难可以说是人类亲手种下的苦果。由自然带给人类的外在不确定性没有消除,人类自身创造的不确定性又大量增加。对此,吉登斯指出“环境破坏现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成了政府工作的焦点。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2] (p145)}吉登斯认为,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要辩证地对待理性和科学技术,也就是要为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运用设置一定的边界。为此,吉登斯主张将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在全球化的意义上,将是创造出一个总体性的关怀全球的体系,它把世界的健康作为一个整体而保留下来。

第三 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对于民主的内涵,吉登斯解释到“民主是一个有效的党派竞选体系。在民主的条件下,选举是定期的、公平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参加。民主参与的权利是与公民自由相联系的,人们享有表达和讨论的权利,可以组建或者参加团体和组织。”^{[3] (p64)}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惨痛教训和现代社会的严密监控,吉登斯认为,在一个高度反思性和解传统化、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时代,更需要一个激进的民主化社会。为此,要推动一种多元政治,即要有对政治上平等的公民所作选择的连续不断的回应。不仅要促进民族国家内的多元政治,还要促进地方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跨国组织中的民主参与程度。就国家关系而言,当今世界并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界,世界上许多

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着民族、种族、宗教和自然资源等各种各样的争端,“要对话,不要对抗”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通过对话方式解决各种争端也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治家们的首要选择。因此,日益全球化的趋势需要一种协调的全球性的民主政治秩序,虽然不会出现 19 世纪末一些学者所相信的“世界性的政府”,但由各个国家提出的合作性的全球政策架构,还是具有现实性的。

第四,非军事化。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暴力问题,吉登斯提出了非军事化社会的理论构想。他认为非军事化社会并不是一个军事暴力消除了的社会,由于全球体系中各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别,而且地缘政治竞争也非常激烈。因而,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有爆发的可能,但吉登斯也同时指出“可是,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有力因素,它预示着一个无战争的世界。”^{[2] (p147)} 这主要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武器工业化在全球的扩散,反而会弱化人们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企图,因为交战双方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他们的所得。二是在国家间的边界大多已经确定和民族国家事实上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的情况下,领土扩张已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意义。三是全球范围越来越明显的相互依赖,加深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吉登斯的结论是“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无疑是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决非毫无依据。”^{[2] (p148)}

三、吉登斯全球风险社会的理论价值和局限性

综上所述,吉登斯从现代性的视野对全球风险社会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分析和反思,并提出了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思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也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

第一,吉登斯从现代性出发,阐述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关系。他探索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动因、后果,看到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相关性,这使其成为了当前全球化讨论中“现代性的全球化”思想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吉登斯比较敏锐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内部矛盾,看到了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风险,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吉登斯却忽视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揭示的现象——自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之日,社会整体的风险已经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副产品”而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如影随形,只不过今天这个“副产品”开始从人们关注视野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吉登斯更愿意相信工业社会一系列日臻完善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已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酝酿了我们今天可能出现的风险社会,然而他也只找到了问题的浅层次根源,其深层次根源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揭示的现代社会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运作逻辑。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剖析,认为促使现代性生成的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资本。因此,无论是现代社会风险还是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其背后的推动力量都是“资本”。资本具有运动和扩张的本性,这种运动和扩张的本性一方面创造了物质财富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资本增值的逻辑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系统、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一系列冲突,这就是“资本逻辑悖论”,可以说资本是现代性一切冲突和矛盾的源泉。同样,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扩张的结果。因为,资本增值的逻辑决定,资本一经产生,它就要冲破民族、国家、地域的界限而向全球扩张。对此,马克思一语道破:“在资本扩张性的推动下,随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6] (p831)} 因此,消除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支配将成为人类社会“自我救赎”,并走出现代性风险的必然选择,但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完成这种“自我救赎”的。这也由此决定,吉登斯提出的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四个制度维度,即超越匮乏型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非军事化四个制度维度也是不可能的。以吉登斯提出的“非军事化”为例,“苏东剧变以后,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国家间关系变得愈益弱肉强食和不公正”。^[7] 而近期发生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战争,以及叙利亚、伊朗等危机都明显证明在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吉登斯提出“非军事化”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贝克、吉登斯所开出的“药方”一方面由于过于理想化,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真正诊断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病因”,而不能做到“对症下药”。

第二,吉登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唤起人们的风险意识,促使人们对当代社会风险的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吉登斯看到了全球化的风险只能在全球的层面上解决,并提出了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

思路,其中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吉登斯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提出的崭新理论,因此,仍然没有摆脱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认为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到现代性的高级阶段,即“反思现代化”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过是步西方社会的后尘,走了一条西方社会已经走完的“简单现代化”的道路。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这既是它们进行现代性选择和创新的前提,也是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情形会变得更加复杂。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单纯面临现代性两歧性矛盾及高度现代性引发的社会风险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大多面临简单现代化、高度现代化以及由简单现代化向高度现代化转型的三重困境,在社会风险的形式上就相应表现为传统风险(非现代因素的后果)、现代风险(高度现代化的后果)、转型风险(现代化转型过程的风险)并存的复合性风险。因此,吉登斯在基于对西方社会分析基础上,所构建的应对全球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一方面将可能难以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复杂问题的分析,其结果是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由于缺乏了他所强调的现实主义而可能只剩下乌托邦了。

第三,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以其对社会的与众不同的理解为前提的。吉登斯对社会的理解即他建构社会理论的前提是社会中的行动主体的行为,坚持行动主体的意志对其社会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通过对行动主体意志及行动的反思来建构社会理论。而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以社会存在为前提的建构原则是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是像自然那样有其规律的,并试图通过对其规律的把握揭示社会的实质。通过对人类历史基于社会存在前提的实践考察,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是以人中心建构的,尤其是以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状态为中心建构的,其结果必然无法预先看到人类行为影响下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生存的刚性反弹,只是在自然界向人类发出刚性生存预警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这样说来,按照吉登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前提,由于其依然以其行为主体为中心,因此,必然不可能基于社会存在,而提出让行动主体受制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样,在其理论指导下运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结果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的整个现代社会的现实结果应该是一样的。虽说吉登斯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思路中提出了乌托邦的理想,但在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社会现实中,他为应对现代性风险而提出的超越匮乏体系到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维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若是仅从其现代性理论以人中心的建构前提展开推理的话,结论并不乐观,即在他以人为前提的现代性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越发展,可能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现代性风险就会越严重。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3]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4] 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5]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7] 吴茜.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各种危机的加深[J]. 理论与改革, 2010(4).

(责任编辑: 郭荣华)